风险与竞争加剧环境下大学生就业选择变化研究

■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大学生就业意愿与选择的变化。结果显示,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出现了四个主要变化趋势:一是升学意愿不断增强;二是体制内就业意愿高涨;三是离开北上广深趋势呈现分化;四是慢就业与新型啃老现象逐渐突显。据此,宏观经济环境虽可以直接解释当前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变化,但其更深层次的个体动机、社会根源和价值态度变迁逻辑还需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　价值观念　劳动力市场　教育竞争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5.011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就业、失业问题较为突出,青年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6月16－24岁青年人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21.3%①,引发社会关注,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特别突出。一些媒体和普通民众通常认为青年失业率高涨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随着疫情缓解、社会生活恢复常态,青年失业问题也会得到纾解[1－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四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见下页图1),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青年失业率就远高于平均失业率。2019年8月16－24岁青年人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13.1%)是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的两倍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略微上升(除个别月份涨幅明显),总体保持平稳,并在2023年5月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水平。但是,青年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不仅在新冠肺炎疫情前远高于平均城镇调查失业率,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从2019年8月的13.1%上升到2023年5月的21.3%,青年失业率达到平均失业率的4倍多。新冠肺炎疫情缓解以来,青年失业率并没有出现下降趋势,相反还在继续走高。

青年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出一个波动起伏规律,每一个年度在6、7、8月到达年度高

收稿日期:2023－07－10
作者简介: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特聘教授,社会学系主任,主要研究社会分层、教育社会学与青少年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新生代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研究”(课题编号:19ZDA1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点，之后有所下降，随后第二年的6、7、8月又到达更高的高点。每年的6、7、8月正是中职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季，青年失业率在此时达到年度顶点，并且近3年就业季的失业率年度顶点一年高过一年：2021年的高点是16.2%；2022年的高点是19.9%；2023年就业季高点还未来临，5月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2022年高点，达到了21.3%，这意味着2023年青年失业率顶点会高于前一年。这种波动规律表明，青年失业率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在不断走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持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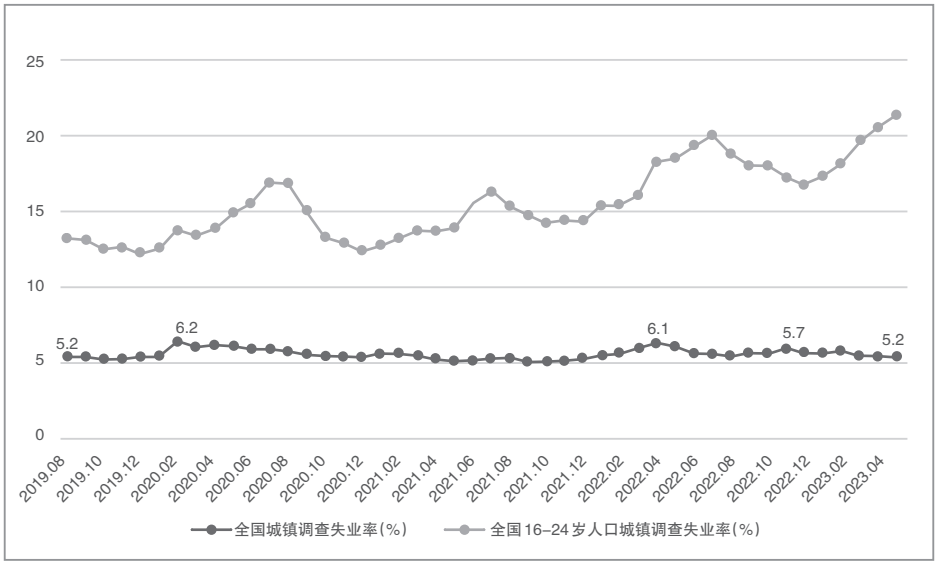


图1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与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①

在青年失业率不断走高的同时，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多。图2(见下页)显示，自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其中，2008－2018年期间增长幅度有所放缓。但是，从2019年开始，大学在校生人数又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这一轮扩招的大学生，在2022年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2022年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比上一年度猛增167万，达到1076万人；2023年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又比上一年度增加82万，达到1158万人；预计未来数年应届毕业生人数还将继续快速增长，大学生就业压力也将持续加大。

经济发展状况、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复苏速度、产业升级情况等客观经济社会环境，无疑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但同时，大学生群体就业观念与行为的变化，以及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加剧和竞争激化的策略，同样也会对大学生就业状况产生影响[4-5]。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与青年失业率上升并存，给大学生带来空前的就业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意愿与就业选择出现了哪些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变化又会给人们的教育选择以及高等教育带来哪些影响？进而又会产生哪些社会经济后果？

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剧使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成为近期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显现，其中包括有关大学生就业观念的研究，但是多数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局限于缺乏实证论证的观点陈述，仅有少数基于实证资料的研究分析，也是采用一次性的、地区性的、缺乏代表性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从而难以全面、系统、深入、准确把握当前大学生就业观念特征和变化趋势。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

① 数据来源：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PSCUS)的数据分析。该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也是国内唯一一项全国性、持续性的综合性大学生追踪调查。自2013年正式启动,每年实施一轮年度追踪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抽选23所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的高校25000－30000万(各年度调查样本数有所差异)在校生和毕业生实施问卷调查。该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代表性,其中各个年度就业观念测量指标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从而可以进行跨年度、长时期的就业观念和行为变迁研究。本文主要选取2013－2021年9个年度调查数据,考查在市场风险和就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意愿与就业选择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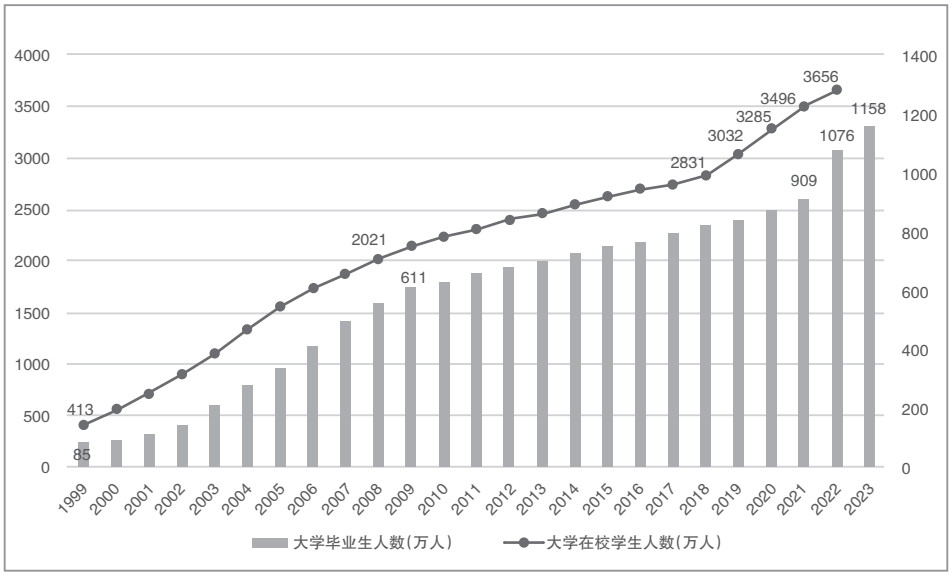


图2　1999－2023年大学在校生与毕业生人数(万人)①

二、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

人们的价值态度与行为选择及其变化,深受外在客观环境和生存境遇的影响,就业观念和行为更是与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紧密相关。当代在校大学生的主体是“00后”,而正在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是“90后”。当“90后”和“00后”大学生迈入或准备迈入劳动力市场之时,正遭遇了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转型期,即从高速经济增长转变为增速放缓时期,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经济受到重大冲击,而外部国际局势变化,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些宏观层面的因素,冲击着劳动力市场,经济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不断上升,就业压力加大,就业竞争激化。在风险与竞争加剧环境下,在校的“00后”大学生和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90后”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发生了转变。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就业选择出现了4个变化趋势。

(一)升学意愿不断增强

通过对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历年数据的比较显示,大学生就业取向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推迟就业,追求更高学历。图3(见下页)左图数据显示,大学生的升学意愿不断上升。自2015年以来,大学生满足于本科学历的比例逐步下降,选择“本科”为期望学历的比例从2015年

① 数据来源: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的16.1%下降到2021年的9.1%；而期望获得硕士学历的比例则逐步上升，从2015年的51.1%上升到56.2%。大学生追求更高学历的意愿在图3右图中反映得更加明显：本科高校大学生普遍想继续学业（考研或留学），越来越多高职院校专科生选择毕业后不直接就业而是继续学业（考专升本）。2019年，76.5%的985/211高校本科生选择毕业后继续升学；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67.3%选择毕业后继续升学；高职院校学生也有27%选择继续升学。随后，选择毕业后继续升学比例还在上升，2021年985/211高校、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在校生选择继续升学比例分别上升为79.1%、69.8%和35.7%。其中，升学意愿上升最明显的是高职院校学生。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直至2015年之前，超过90%的高职院校毕业生都选择毕业后直接就业，而现今超过三分之一高职院校大学生想升学。985/211和普通本科高校学生在2019年就已经有极高比例选择继续升学，之后其比例呈微弱上升趋势，至2021年，接近80%的985/211高校本科生和接近70%的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选择毕业后继续求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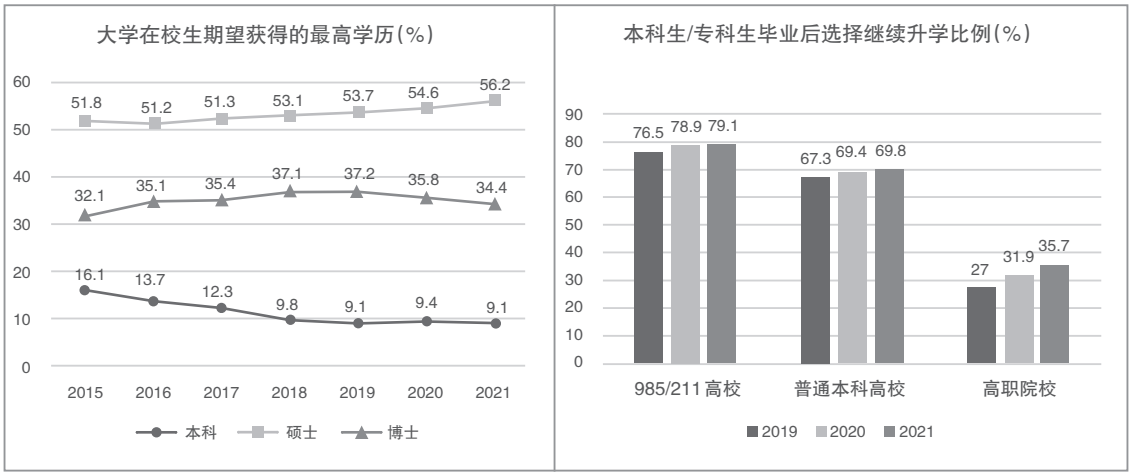


图3　大学生的高学历追求意愿趋势

大学生升学意愿上升的同时，就业意愿逐步下降。不论是985/211高校，普通本科高校，还是高职院校，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的比例都逐年下降。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19－2021年期间，985/211高校本科生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的比例从17.3%下降到14.8%，普通高校本科生相应比例从26.1%下降到25.4%，高职院校专科生的相应比例从65.1%下降到52.5%。大学生对就业压力加剧、就业竞争激化的直接回应是推迟就业并追求更高学历。

（二）体制内就业意愿高涨

大学生就业观念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高涨。虽然长期以来留校教书、进国有企业和考公务员，一直为大学毕业生所热衷，但在2018年之前，去外资企业就业是许多女大学生的首选，而“互联网大厂”等新兴行业、高科技产业私营企业的高收入对许多男大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然而，2018年之后，大学生对就业单位选择出现了极为鲜明的变化趋势，即对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高涨。

图4（见下页）显示了2013到2021年大学生工作单位选择的变化趋势。从历年情况来看，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事业单位，其次是国有企业。2018年以来，选择想去这两类体制内单位的比例上升趋势明显，选择想去事业单位的比例从2018年的27.5%上升到2021年的32.5%，想去国有企业的比例从25.5%上升到28.2%，而2018年之前各年度相应比例则有所波

动。选择比例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党政机关单位就业，从2018年的6.2%上升到11.8%，这导致考公务员热一浪高过一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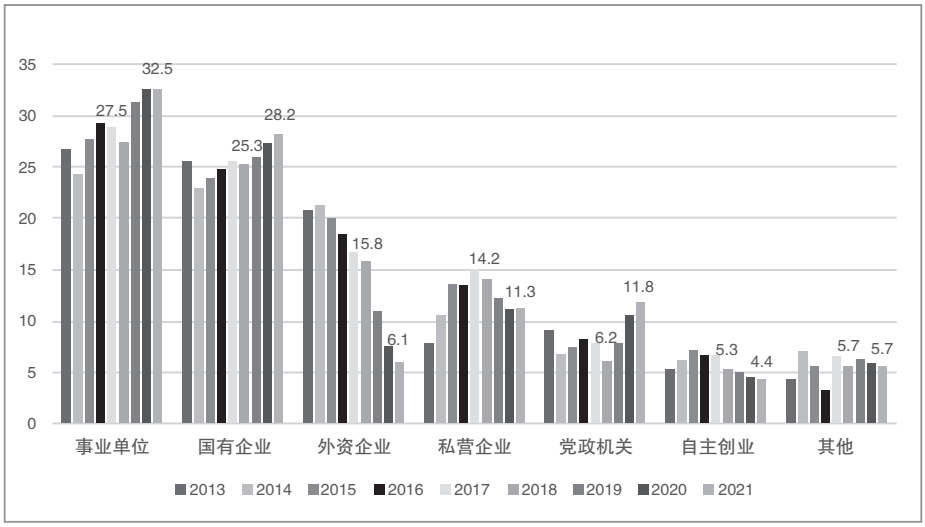


图4　大学生最想去的就业单位(%)

2018年以来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高涨趋势在图5(见下页)中反映得更加明显，选择想去体制内就业的比例从2018年的59%上升到2021年的72.5%，而之前的2016至2018年期间，体制内就业选择比例呈微弱下降趋势。

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高涨的同时，体制外各就业单位的选择意愿则不断下降。首先，想去外资企业就业的比例断崖式下跌，在2018年之前，这一趋势已经有所显现，而2018年以来这种趋势加剧发展；其次，选择私营企业比例在2017年之后明显下降，而之前是逐步上升；最后，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也是在2017年之后明显下降，而之前则呈上升趋势。

大学生就业单位选择的变化趋势，反映出大学生应对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策略，即把具有较高稳定性的体制内就业当成规避市场风险的避风港。在经济风险增大和不确定性增强的大环境下，追求稳定性和安全感，规避市场风险，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流取向。

(三)离开北上广深趋势呈现分化

大学生就业意愿的第三个变化趋势反映在就业地点的选择上，也就是图5(见下页)呈现出的离开北上广深的趋势，从2018至2021年，大学生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为最想去的就业地的比例从38.1%下降到32.7%。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分布格局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集中着最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从而成为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的就业地，他们可以在这些一线城市寻求高收入就业岗位，谋求具有极好发展前景的职业。但同时，人才济济的一线城市，机会竞争也必然十分激烈。竞争压力、高涨的房价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使许多大学生被迫离开北上广深，或者不敢选择来此就业发展。因此，多年以来，“逃离北上广深”还是“留在北上广深”，是许多大学生纠结难决的选择。图5(见下页)显示，2013－2017年期间，并未出现明显的离开北上广深的趋势，相反，选择最想去北上广深就业的人数比例一直在上升，并在2018年达到高点，而2018年之后才真正出现了离开北上广深的大趋势。同时，图6还显示，2018年以来，大学生就业地选择变化，除了呈现出离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趋势，还呈现出

走向三、四线中小城市和县城的趋势，虽然这两项选择的比例较小，但增长趋势明显。选择三、四线中小城市的比例从2018年的6.8%上升到2021年的10.8%，选择县城的比例从2.8%上升到2021年的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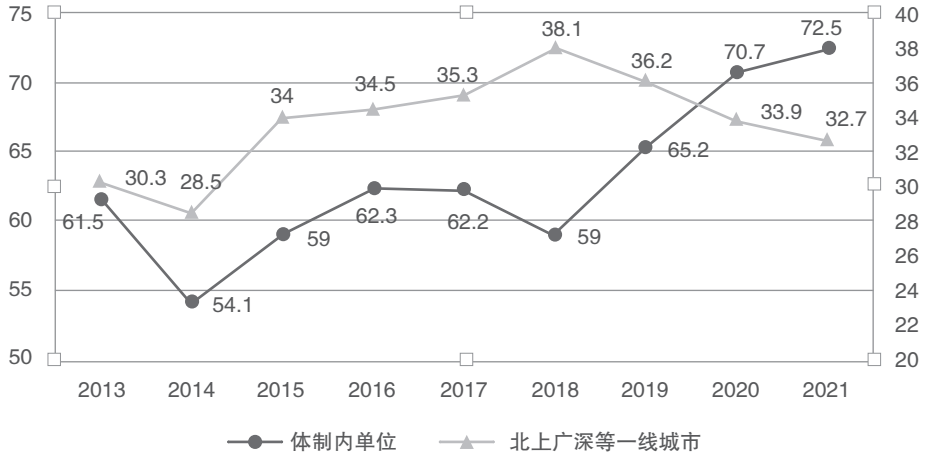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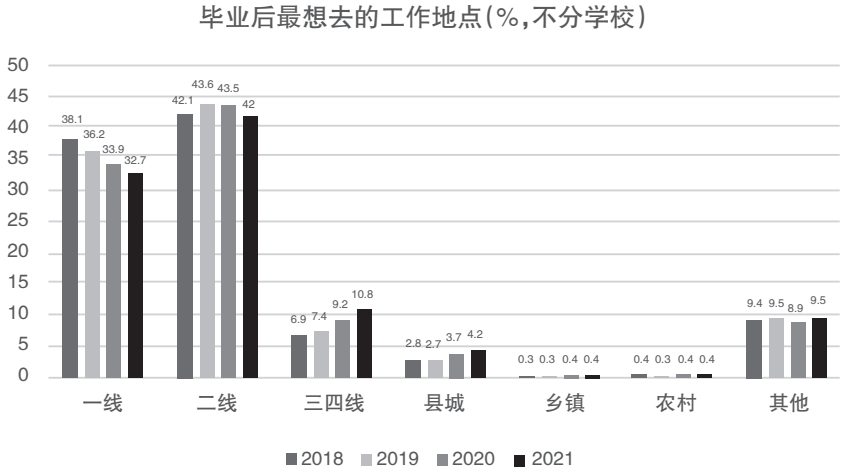


图5　大学生就业单位和地点选择变化

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地点的选择，可以发现离开北上广深的趋势有所分化。图6显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离开北上广深的趋势非常明显，选择北上广深的比例从2018年的57.9%大幅下降到2021年的25.8%，同时选择二线城市的比例从27.2%大幅上升到47.7%，并且成为比例最高的选择。这说明，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仍然倾向于选择大城市就业，只不过在一线城市难以与985/211高校大学生竞争，从而退而求其次选择二线城市。图6显示，高职院校大学生不仅表现出离开北上广深的趋势，而且还显露出离开二线城市的趋势，选择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比例则明显增长。不过，二线城市仍然是高职院校大学生比例最高的选择，说明虽然呈现出离开一线和二线城市的趋势，但大城市就业还是他们最期许的选择。与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大学生离开北上广深趋势不同，图6显示，985/211高校大学生并没有出现离开北上广深的趋势，相反，选择北上广深的比例还在持续上升。985/211高校大学生选择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比例非常低，同时选择二线城市的比例近年来还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近几年一些二线省会城市对985/211高校毕业生吸引政策力度减弱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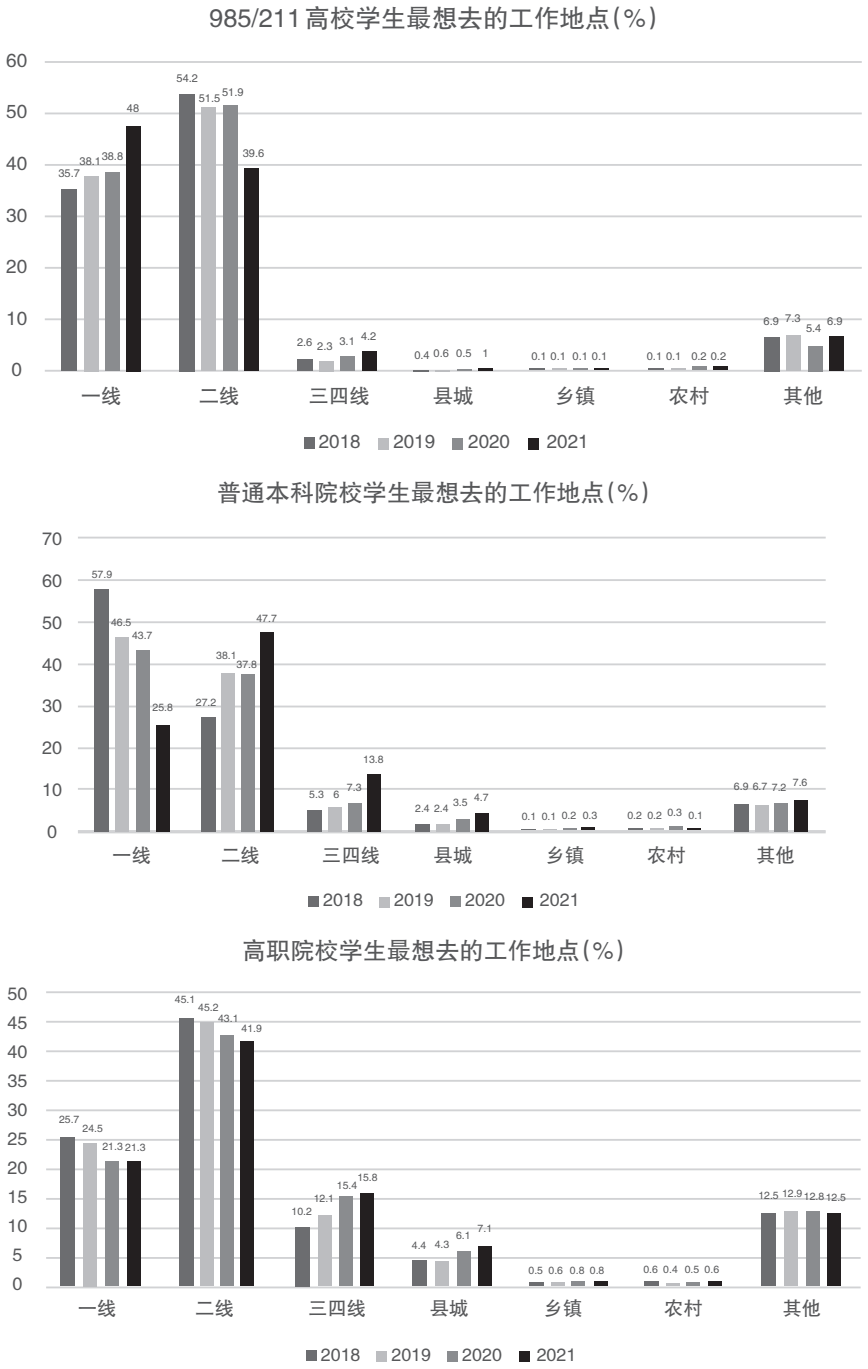


图6　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就业地点选择比较(2018－2021年)

虽然大学生就业选择出现了离开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的趋势,以及走向中小城市的比例有所增长,但是总体而言,大城市就业仍是大学生就业地选择的主流倾向,只不过基于大学文凭的等级分层,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选择有所分化,985/211高校大学生最理想的就业地还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大学生最理想的就业地是二线城市。中小城市和基层就业选择比例虽然有明显上升趋势,但还是少数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大学毕业生涌向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的潮流,就业地选择出

现分化，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根据自身大学文凭的市场竞争力而调整就业地，出现多元分流趋势，选择中小城市的支流有所增长。

（四）慢就业与新型啃老显现

大学生就业意愿的第四个变化趋势是慢就业与新型啃老日趋明显。图7数据显示，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持续下降，从2018至2022年，半年后的就业率从53.2%下降到40.1%；升学率从25.4%上升到33.1%；与此同时，未就业率从14.2%上升至20.3%。也即，2021年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既未就业也未升学，他们或者是没有找到满意工作而在继续找工作，又或者是考研考博失败而准备再考，还有部分在准备公务员考试，这些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慢升学”或“慢考公”，其中绝大部分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以维持生计，即新型啃老。之所以称之为新型啃老，是因为与以往人们所认知的啃老行为不同，这些啃老的大学毕业生是在为继续升学或提升就业能力做准备，“慢就业”“慢升学”和“慢考公”的啃老行为，并不是对自身的放弃和躺平，而类似于人力资本投资，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获取学历文凭、资格证书和劳动力市场信息，最终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更稳定的职业地位和收入。对于新型啃老行为，社会舆论和父母们更为宽容、接纳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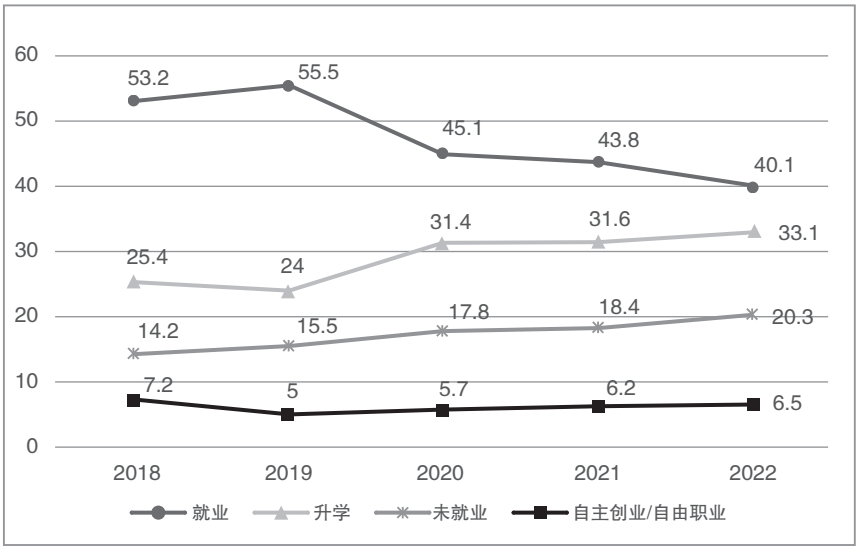


图7　2018－2022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与升学比例（%）

表1（见下页）呈现的数据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大学生慢就业和新型啃老的基本状况。2021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包括2018、2019、2020和2021年4届大学毕业生样本，表1数据列出了这4届毕业生在2021年11月（调查时间）的所处状态。其中，21.6%升学成功成为在读硕士生、博士生或海外留学生；57.8%已经就业，绝大部分已经就业的毕业生是在毕业当年就业（47.3%），但还有少部分（10.5%）是在毕业后1－3年才找到工作开始就业；另外，有12.5%的毕业生毕业后从未就业。

基于上述数据可以粗略估计这4届毕业生新型啃老的比例和构成：（1）12.5%毕业后从未就业者是典型的新型啃老者；（2）10.5%毕业后1－3年才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曾经是新型啃老者；（3）21.6%升学成功者中有一部分经历了“二战”或“三战”考研考博，他们也曾经有过啃老经历。综合推算，这4届毕业生中大约接近三分之一有过或长或短的新型啃老经历。由此可以发现，慢就业、慢升学和新型啃老成为当今大学生就业行为的常态，同时也是他们缓解就业压力、

适应竞争环境、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策略。

表1　2021年调查数据显示的2018－2021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升学状况

就业/升学/未就业(比例)		
升学	21.6%	毕业当年就业:47.3%
就业	57.8%	毕业1年后就业:7.1%
自主创业/自由职业	8.1%	毕业2年后就业:2.7%
未就业	12.5%	毕业3年后就业:0.7%
合计	100%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多年度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变化趋势。在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化的背景下,深入探讨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倾向。

(一)主要研究发现

综合前文数据分析结果,在市场风险与就业竞争加剧环境下,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出现了4个主要变化趋势:一是升学意愿不断增强;二是体制内就业意愿高涨;三是离开北上广深趋势呈现分化;四是慢就业与新型啃老日趋明显。

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的4个变化趋势,反映出了大学生在市场风险与就业竞争加剧环境下不断调整应对策略,同时这些应对策略背后也体现出当代“90后”和“00后”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走向。升学意愿不断增强,是大学生面对就业压力加剧、就业竞争激化的直接回应。一方面,继续升学既可以推迟就业,延迟直面激化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追求更高学历也可以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争取获得更高的职业发展平台。体制内就业意愿高涨,是大学生应对不断加剧的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策略。体制内就业可以规避市场风险,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环境下,获得稳定和安全感。离开北上广深趋势的分化,也是大学生规避市场风险和应对就业竞争的一种策略,基于文凭所代表的就业竞争力,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在发展机会较多但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与发展机会较少但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小城市之间,试图谋求最佳平衡点。

(二)原因探讨和理论解释

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因素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增速放缓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就业竞争激化等因素。

对于当前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取向,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可以提供一些解释。人力资本理论[6-7]和信号筛选理论[8]强调了学历文凭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解释了大学生升学意愿不断增强的个体动机。市场或部门分割理论[9]提出劳动力市场是被区分为不同的部分,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正规就业部门主要提供具有稳定性、高收入和发展前景的就业岗位(与大学毕业生学历专业相匹配的就业岗位),这可以解释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的高涨。离开北上广深、慢就业和新型啃老都是大学生在市场风险与就业竞争加剧环境下的个人的理性选择。

社会学家则跳出劳动力市场范围和个体层面的行为动机,从更广泛的社会宏观层面解释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及其变化。对于风险和竞争加剧环境下大学生升学意愿不断增强的趋势，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10]。柯林斯认为，现代社会是文凭社会，文凭成为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机会，并由此取得相应的经济社会地位。教育扩张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历，而高学历的人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会使工作职位对学历的要求也水涨船高，从而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学历文凭的贬值。面对文凭不断贬值，人们的应对策略是不断增加教育投入，获得更多的教育，取得更高的学位，教育竞争成为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代际社会学的公共生命历程理论也有助于解释当前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的变化[11]。这一理论认为，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遭遇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或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之为公共生命历程），会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青年群体形成代际共性。“90后”和“00后”大学生在他们从学校走向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人生转型阶段，遭遇了我国经济转型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引发的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这一群体在就业意愿和选择倾向上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群体趋同性，如追求高学历和体制内就业等，而这种趋同性又加剧了教育竞争和就业竞争。

总之，宏观经济环境虽可以直接解释当前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变化，但更深层次的个体动机、社会根源和价值态度变迁逻辑还需从多角度进行深入详解。

（三）对后续影响的延展讨论

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的变化倾向是多种经济社会影响作用的结果，同时，这些就业观念和行为选择又会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多个领域产生影响。

首先，大学生升学意愿高涨正在对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在当今大学校园，学业竞争的主要目标发生了转移：从准备未来就业竞争转移到争取升学机会竞争，考研、免推资格竞争严重；同时，学生学习目的也发生转移：从掌握职业技能知识（为就业做准备）转向注重理论书本知识（为升学考试做准备），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考研越来越趋于“高考化”。为了升学成功（如考研、考博），学生过于注重考试成绩（如G点），弱化了学生就业能力培养。

其次，对高学历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错配和岗位错配现象。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低职高配现象越来越多，以往中专生、高中生就可以从事的就业岗位，现在许多本科生、硕士生去应聘竞争；而大专生、本科生就足以胜任的就业岗位，许多硕士生和博士生经过激烈竞争才得以获取；甚至一些大学生不得不“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从事蓝领工作。同时，许多企业和雇主并不愿意因就业者的学历高而提高相应就业岗位的工资，导致低职高配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所能获得的工资水平与他们的教育投入不相匹配。就业岗位待遇与大学生期待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失业。

再次，离开北上广深趋势的分化，正在导致教育分层的就业市场，即依据大学文凭在劳动力市场的含金量，出现大学生就业的地域/行业/单位分化，比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成为985/211大学毕业生的主战场，最有发展前景和待遇保障的体制内就业岗位也往往只有985/211大学毕业生有机会参与竞争，而其他的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毕业生越来越被排挤出这些地域、行业和单位，由此导致普通大学文凭贬值而精英大学文凭增值，进一步激化了优质教育资源竞争。

最后，慢就业与新型啃老现象日益突出，导致经济压力出现代际转移。拥有更多资源的家庭可以为“慢就业”“慢升学”的子女提供更多、更长期的啃老支持，也使子女有更充分的就业准备和更强的升学竞争力，而家境较差的大学毕业生“慢就业”“慢升学”则难以维系，更可能不得不接受不满意的工作岗位或放弃继续升学的打算。

[参 考 文 献]

[1] 李春玲:《疫情冲击下的大学生就业:就业压力、心理压力与就业选择变化》,载《教育研究》,2020年第7期。

[2] 付　悦:《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就业的内卷化及其破解策略》,载《现代教育科学》,2023年第2期。

[3] 罗晓婷 张炎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我国如何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以新冠肺炎疫情后发达国家促就业经验为例》,载《陕西教育(高教)》,2023年第7期。

[4] 赖德胜 何　勤:《当前青年群体就业的新趋势新变化》,载《人民论坛》,2023年第11期。

[5] 黎娟娟 黎文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视角下的大学生慢就业——基于北京某高校的质性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6]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1964, pp.112 – 178.

[7]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

[8] 刘　霄:《存在、时效与合理?——信号筛选视角下对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教育信号三重特性的实证检验》,载《高教探索》,2020年第12期。

[9] Cain, G. G.. The Challenge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ies to Orthodox Theory: A Surve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6, (14).

[10] 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刘　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Ⅴ页。

[11] 李春玲:《代际社会学: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独特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刘　彦)